

闽籍学人

# 又一位被“清华”破格录取的大家

## ——写在《郑朝宗论世界文学名著》出版之际

□俞兆平

郑朝宗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,师从吴宓先生等。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除“钱学研究”等方面之外,主要表现在现代小说研究上,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上海《时与文》等报刊上发表系列评论世界文学名著的文章。

由此,他于1949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,选的就是“现代小说”专门方向,在这一课题上造诣颇深。但遗憾的是,他在这方面的文章散落不全,其民国版的《小说新论》于今更为罕见。为此,先生在《海夫文存》“序”中叹道:“此49篇文字,但观题目,便知内容杂而不专,未足以供方家一顾。”可见先生对这种“不专”之状心有戚戚,我们在受业时也听过先生于此之感慨。可庆幸的是,现经弟子们尽心竭力地搜寻,终于编成此书,算是告慰先生,了结他的一番心愿。

而新发现的20余篇先生的小品散文更是难得,弥足珍贵。先生在《海夫文存》“作者小传”中曾作如此自述:“从大二年起就喜欢弄笔,常在《清华周刊》副刊及林语堂主编的《人间世》《宇宙风》等刊物上,用笔名或真实姓名发表小品散文。”但这类文章弟子们多未见过,我问过先生,他淡然一笑:“都过去了。”先生一生,经战乱,遭困顿,大起大落,历尽沧桑,故而不在于过往之文事。现今却如天意般,由“孙辈”从网络上偶然得之,这是郑门弟子之福分。

郑朝宗先生1910年生于福州一书香世家,父亲郑以珩(号凤翔)20世纪初曾在北京“五城学堂”任职,为总教习林纾看中文,请他帮忙抄写译稿,及校正誊清,送交出版等,实为助手矣。故而常出入林府,亲见林纾“耳受手追,声已笔止”的天才式翻译小说的实况。先生还记得,小时家中还存有林纾的译稿和书信,但在“文革”中化为乌有。如此的家学渊源,先生国学根底自然深厚。青少年时代的先生,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,念的是教会学校,从而打下了扎实的、精湛的英文基础。但他回忆说,这12年中,

虽然天天做礼拜,听教士布道,却对基督教没一丝一毫好感,反而对远山寺里冷清的钟声、静默的佛像产生感念,有时脑中甚至会生出出世之想。

1932年,先生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,据先生长子郑天曜《家父郑朝宗遗事纪略》一文:“父亲说,他报考清华大学时是当年该科系福建唯一被录取的学生,他数学卷仅得3分,但语文成绩优异,得了满分,所以被录取了。”就此,我不由得想到钱钟书先生1929年亦以数学15分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传闻,难怪他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,或许在“破格”一事上早就心神相印了。

先生之学识自不待言,能在钱钟书《谈艺录》“序”中留下名号的,自当非同常人。钱先生曾对他俩之交做过评价:“知管仲者鲍叔,知我且胜我自知者郑子也。”尽管语中多有自谦之意,但能以“管鲍”为拟,可以看出郑先生在师兄钱先生心目中的位置。

先生学术成就的峰点之一,为上世纪40年代对欧洲古典小说的系列评论。当时先生的理论基点,趋近文学艺术取决于“种族、环境、时代三大因素”的法国批评家丹纳的体系,上世纪50年代后开始吸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,他总体是倾向现实主义原则的。先生说:“书是天、地、人三个因素的总和;它是作者先天的气质,加上所处地域的特性,再加上后天的人为环境的总结。”但先生并不排斥创作主体的功能,他的“现实”也包括了现实存在的作家主体,由此,你方可理解先生何以会对雪莱《诗辩》中浪漫主义情怀,及神秘“灵感”也予以赞赏。

在评《悲惨世界》时,先生强调“一切作品都是作者整个人格的表现”。由于雨果人格复杂,在社会方面是人道主义者,政治方面是激进党,满脑都是政治哲学,而气质上却是天生的诗人,生活经历又十分丰富,这些矛盾、凌乱的因素,造成该小说历史不像历史、论文不像论文、传奇不像传奇的臃肿

不堪的状况。这一别开生面的评判,与先生立定“现实”的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。

先生遵从现实主义文学原则,但对新派的文学理论观念并不排斥。在1947年,他就娴熟地运用福斯特《小说面面观》中“扁平人物”和“圆形人物”的理论,对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形象进行评析,而我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重新见到该书的译本。

至于“意识流”创作流派,先生亦早已了然在胸。1948年,他评《罪与罚》:“陀思妥也夫斯基不像后来的‘意识流’派的作家,那些作家专喜作抽象的分析,一部作品里,除了川流不息的所谓意识外,什么也没有。”陀氏虽是“心理小说”的鼻祖,但他“似乎预先看到了这一点,他不肯凭空刻划意识,而要让外界具体的事件来反映意识”,所以他的作品有血有肉,能直抵人的灵魂深处,与那些一般志在意识外作浮光掠影式的作家截然不同。先生之见解可谓先声夺人,于今仍有启示意义。

读着先生的文章,常为他独到而警辟的见解而折服。像福楼拜笔下的《包法利夫人》,“仿佛看来,此书似可题作《法国潘金莲外史》。……此书不特非淫书,实际还是最有效的劝世奇文”。因为它是借一个浪漫女人的堕落,对庸碌、懦弱、势利、麻木、卑鄙、险诈的中产阶级的抨击及其灵魂的揭露。

评《父与子》:“屠格涅夫的小说再像烟不过了,而且是轻烟。它漂亮,活泼,然而大风一吹,立刻化为乌有,因为它又稀薄,虚幻。”由于屠氏长期生活在海外,对本国的情形如雾里看花,又受到法国文风的影响,故而如此。

又如,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:“这两位无论在优点或缺点方面,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。他们的优点是精力充沛,善创造,富想象,作品来得容易,人物的范围和数量更大的可惊。他们的缺点是乱头粗服,文字斟酌,感觉不够细致,写实中露出浪漫作风,不会描写上层阶级。”优劣之处,立见分

明,可谓一语中的。

而像“19世纪的俄国小说,大概可用《战争与和平》和《罪与罚》来代表。这两部作品,一以博大胜,一以精微胜”。短短一句话,便可见先生视野之阔大、学殖之深厚。

本书“附录”为“新近发现的郑朝宗佚文”。读了这部分先生自称为“小品散文”后,他在我心目中仿佛变了副样貌,不再仅是老成稳健、正襟危坐的长者,眼前还浮现出一位英气勃发、气宇轩昂的青年书生模样。那种有话便说、有气便出的率真、耿直,呈现出先生另一面的品格,若按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来说,它还原了郑先生的“圆形人物”形象,青年时期形神的补充、添加,使他立体化了。

在《载道与言志》《勇气救国论》《时代的呐喊》等文中,一位以报效国家、拯救民族为己任的热血青年挺立在我们面前。1998年,在先生追悼会上,从悼词中我方得知先生在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,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,在烽火连绵、民族危亡之际,能胜任此职定为群体中的佼佼者,这从上面的文章便可寻得先生的思想轨迹。

先生的这批佚文还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,像《怀吴雨僧先生》,除了写出战乱中清华师生之间真挚的怀念情感之外,还勾勒出不可多得的吴宓先生当年的形象。“文革”后,先生曾在为吴宓先生平反昭雪的申请书上签名,1987年又写了一篇《忆吴宓先生》。先生写冯友兰先生也有两篇,一篇写在1935年,一篇写在1947年,前者恭敬万分,后者颇有微词,对主人公的品评逆转直下(先生对周作人亦复如是),原因是随着时光变迁,冯先生有“太爱‘坐飞机’”的偏嗜,于学者来说“有点不安本分”。另《噩梦》一篇,受启于钱钟书先生《写在人生边上》中的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》,称之为姐妹篇亦可,串起读之,对当年文人心态可有深度的了解。

新书纵览

## 《宋神宗》

迟振汉 著 东方出版中心



作者认为,宋神宗是一位年轻有为、勤俭无华、勇于改革、行法持衡的有为之君,终其一生态在振起有为、理财富强、兴旺大宋,做了很多前朝君主所不敢做的工作。同时,作者也指出,熙宁变法过于急躁,不仅扰民,而且影响新法的效果;“新旧人两用之”的用人策略又导致其后的政治腐败、财政穷蹙,终至金兵南下,徽钦二帝被俘;与辽维持和平,但大举伐夏损失惨重,壮志雄心蒙受挫败,竟因而致病,于38岁英年崩逝,壮志难伸,实甚可叹。

## 《高启:诗人的穷途》

牟复礼 著 颜子楠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高启是明代首屈一指的诗人,在某种程度上缔造了有明一代诗歌的气象、规模与轮廓,却在盛年因卷入苏州知府魏观的冤案横遭腰斩。高启有集传世,但因为始终未被平反,生平记载少之又少,青年时代充满了谜团。本书从高启的诗歌入手,勾勒出高启的行踪与交游。更可贵的,是本书并不止步于钩稽诗人生平,而是将个人的升沉置于元末大乱、群雄逐鹿与明初的高压时局下。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政权,是曾让青年高启寄托英雄主义豪情的存在,之后则由幻灭转为疏离,这段经历终成为高启命运中难以摆脱的伏笔。

## 《重建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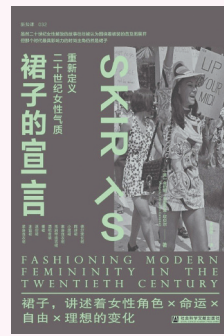
埃里克·方纳 著 王希 译 商务印书馆



1865年,美国内战结束,75万南北方士兵战死沙场,美国人随即面临修复战争创伤、化解区域敌意、重建美利坚联邦的挑战。最艰巨的挑战则是:如何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创建一个新的自由劳动体制,如何将400万奴隶变成政治上拥有权利、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公民,以及如何将普遍自由、种族平等和跨种族民主等新宪政原则付诸实践。重建的故事围绕这些挑战而展开,错综复杂、跌宕起伏,历史与未来在此时交锋,理想与现实在此刻博弈。

## 《裙子的宣言》

金伯利·克里斯曼-坎贝尔 著 李景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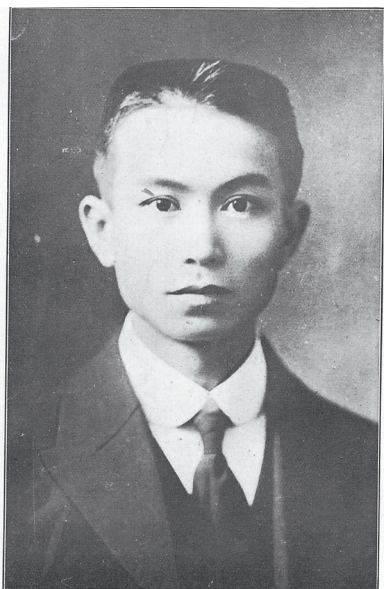


虽然女性解放的故事常常被定格在20世纪人们对裤子的日益接受上,但那个时代最重要、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时装仍然是裙子。福图尼、香奈儿、帕图姆等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,同时融入新的品位和技术,设计的裙装重新定义了20世纪的女性气质。这部闪耀的社会史通过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裙装——德尔斐长裙、网球裙、小黑裙、无肩带连衣裙、酒吧套装、迷你裙、迷笛裙、紧身连衣裙……追溯了20世纪女性角色的转变,记录了女性自身不断变化的命运、自由和理想。

书林漫步

# 陈敬贤病中译书

□付蒙蒙



陈敬贤(1935年厦大毕业纪念册)

陈敬贤出生于1889年,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胞弟,比陈嘉庚小15岁。陈嘉庚办学是和经营实业同时并进的,实业

在新加坡,办学主要在家乡集美,这是兄弟两人的共同事业。因此,兄弟二人经常要分居两地交替工作。

1918年,陈敬贤亲自督办的集美师范、集美中学开学,他筹划、督建了新教学楼群和配套设施,初步形成了集美学校宏大的规模。开学时,陈敬贤公布了和陈嘉庚亲定的“诚毅”二字为集美学校校训,并亲定《福建私立集美学校校歌》。但鲜为人知的是陈敬贤曾翻译过一本书,这本书是《藤田式调和法前传略解》,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陈敬贤自幼体质虚弱,时常不堪劳累而病倒。1908年,他出任谦益米店经理后即患肺病。1919年至1921年主持嘉庚公司业务,在商战中心力交瘁,肺病复发,兼患痢疾、胃病等症,便在1921年11月从新加坡回国休养,设立调和会,提倡静坐法,同时仍主持集美学校校务,监理嘉庚公司国内外各分行事宜。

他阅读《心理建设》,获悉日本高桥先生治疗胃病有独特之处,随后东渡日本访高桥,由高桥介绍给藤田灵斋先生诊治先后两次。藤田灵斋是日本著名的静坐大师,陈敬贤此后多次访晤跟他学习调和法。

为了“造就有道德与智识兼备的人才,

出来担负国家及社会的责任”,1923年10月,陈敬贤在集美学校设立调和会,研究养生之术,广泛宣传调和法,希望以此加强体格锻炼和意志修养,提高师生身心素质。同时,组织集美学校建设委员会,“申赌禁,设戒烟所,清理公共卫生,修造道路,净化环境,学村面貌焕然一新”。还邀请藤田灵斋到集美演讲。

陈敬贤翻译的《藤田式调和法前传略解》在1924年出版,此前的1923年10月16日,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开始连载这本译著。陈敬贤的翻译非常严谨,但在书印完之后,发行前批阅了一遍,发现有两样不足。他在该书前面的“紧要启事”中说:“本书为读者便利计,用新式标点符号,共计十三种,藉以醒目,不意该书多被印错,甚至非疑问句而用‘?’于句尾句而用‘,’岂不可笑!”“本书错误之字尤多,约三十余(其他尚有差误多处不备举),兹不得已已错误之字上,另加红色字,以免误会。”

陈敬贤原本计划重印,然而当时已印成2000册,“悉行销毁,亦殊可惜”;又感觉这本书事关“吾人身心各方面之利益”,有急速宣传的必要,不能再延误了,于是在稍作订正后迅速推向市场。

1925年8月,陈敬贤认为病未痊愈,若长此敷衍下去,不独对身体有害,而且对“所作之事亦无利”。10月,从上海再次到日本向藤田灵斋学习静坐调和法。1926年6月,他在镰仓时租了田园,亲自种菜锄草,“一面藉外部之劳动以锻炼身体,一面使精神有所寄托,以休养头脑”。移居神户后,定于“每晨五时起床,以冷水湿巾摩擦全身之皮肤,再以干巾擦干。又于早晨、午前、午后、晚间必出野外散步,每次数十分钟”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期起,陈敬贤专心研究禅理,遍游名山古刹,最后居住在杭州弥陀寺,因旧病复发兼患唇毒疮,治疗无效,于1936年2月20日与世长辞。集美学校举行追悼大会,悼念他毕生奉献给教育和社会的丰功伟绩,收到各界挽联题词600余件,其中有于右任、邵力子等名家。弘一法师闻讯,悲痛异常,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小传。

1937年1月,为了纪念陈敬贤,集美学校把礼堂改名为“敬贤堂”,尊称他为“二校主”。上世纪80年代初,陈敬贤公子陈共存于集美学校北侧建造佛教墓塔一座。1990年3月14日,陈共存先生将暂时寄存在南普陀的父母骨灰护送回乡,安放入墓塔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)

灯下漫笔

# 闽南蔡玉卿:女性书法丈夫气

□刘德恒 杨昌新

在古代福建,女性名人之数量甚为寥寥。据《福建名人词典》所载,903位名人之中,女性仅占11席,蔡玉卿荣列其间。

在中国古代,女子难以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之观念长期禁锢女性于政治、文化等领域之外。后世提及蔡玉卿,多以其为著名书法家黄道周之妻而知名,然而,蔡玉卿本人,作为明末清初诗书双绝之才女,在动荡时代,不屈于命运,以独特之艺术风格与深厚之书法造诣,创作出属于女性之壮阔诗篇。

蔡玉卿(1612—1694年),名润石,字玉卿,龙溪鹤峰人,明末清初书法家、文学家。

据《文明夫人行状》记载,蔡玉卿“生鹤峰徵士家,性嗜书,能居约,不苟言笑,十岁能属文,事母陈氏以孝著”。

蔡玉卿作为诗书双绝之才女,她的才华不仅仅体现在诗词的细腻之中,更在于书法艺术上的非凡造诣。后人形容她的书法“受晋唐法帖规范,又融合金文、碑版格调”于苍劲中显露出特有的婀娜和灵秀浑逸的神韵。可见蔡玉卿的书法法法严谨,触笔刚毅,字皆精琢,字行间透隶书之味,势颇欹侧,而稳雅如山峦峭削,不乏柔美之态。

南明隆武帝元年(1645年),黄道周请兵北上抗清,十二月在江西婺源被俘,蔡玉卿写信劝丈夫尽忠,其中有“自古忠贞,岂顾

内顾,身后之事,玉卿图之”诸语。这种出于闺阁却豪情万丈的艺术风貌,于书坛树起了“女性书法丈夫气”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备受时人赞许。

清朝诗人王士禛在《居易录》中记载:“年将九十,尚无恙。能诗,书法学石斋,造次不能辨,尤精绘事。”她的书法风格与黄道周有异曲同工之妙,两人的作品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深刻的文化内涵。蔡玉卿《山居漫味卷》,绢本,小楷,纵23.7厘米,横210厘米。卷末有“蔡玉卿字润石”“润石”“玉卿印”等白文印,其书法的特点及风格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蔡玉卿的书法楷模其夫,此亦映照出在中国古代社会,女性多受传统角色之限,

于艺术追求之境地,空间颇为局促,然此时代之限,反铸就蔡玉卿勇于破旧立新、追求自我表达之女性书法,承载着女性独立精神与时代变革之见证。故时人称其书作如男儿之刚强,赋予女性以刚毅不屈之力,于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不朽之印记。

蔡玉卿之画作存世仅一幅,为晚明清初女画家作品之鉴藏目中所罕见。然而,蔡玉卿之诗、书、画三者得以幸存至今,如上海博物馆所藏《山居漫味卷》,福建省图书馆之行书《孝经》及国画《梅花》,皆为蔡玉卿之传世佳作,在福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独特地位。

(作者单位: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)